

自由主义、知识贵族、公民德行

林毓生

要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用五四思想是不可能的。五四思想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那样的主流思潮笼罩之下，其历史后果则是：激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渐进改革思想的摧残。五四时期鲜明的旗帜当然是民主和科学。但是，早期五四对于宪政民主和经验科学的理解很快被激进主义式的理解所取代，「大众民主」和科学主义式的伪科学则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科学了。要想根据那样的理解来达成早期五四的目标，当然是不可能的。

本刊记者 施雨华

1960年，一个台湾学生“因为机缘”来到芝加哥大学，投到著名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门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那年，他26岁。导师哈耶克撰写过《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又一部巨著《自由的宪章》（或译《自由秩序原理》）刚刚出版，他成为杰出政治思想家的情势已经明朗。九年后，这个学生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再过一年，他将正式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那年，他35岁；在台湾，他的另一位授业恩师殷海光溘然长逝。很多年后，他这样回忆两位导师，“哈耶克先生给我的是知识贵族精神的召唤；殷先生给我的则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

2004年五月，当年的年轻学生，如今的著名学者，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职上荣休，“退休以后，可以自己做研究、专心写作了，心情特别好”。下半年，他回到中国讲学访问，从北到南，一口没有「京油子」口音的北京话，在各个大学的